

24.07

三台文史資料選輯

第 六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三台县委员会
文 史 資 料 征 集 委 員 会 编

三台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 辑

Yue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三台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征 集 委 员 会

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三台

目 录

三台早期的共产党人·····	唐宏毅	1
国民党人徐堪·····	马宣伟	13
王道立传·····	汪远华 陈 彬	22
勿忘“七·七”		
——纪念芦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会上的发言·····	吴孔嘉	27
风雨同舟		
——解放前川北大学共产党员、盟员并肩战斗纪实		
·····	胥正元	31
民国时期的三台县银行·····	曾茂林	37
三台自行车史话		
——从零到十二万辆，沧桑巨变六十年·····	张伯川	44
习商漫话·····	邓惠生	52
再说三台名小吃·····	棕 林	61
三台县的烟祸与禁烟·····	唐太沛	75
三台仁慈医院·····	金文明	89
我与篆刻·····	牟 柯	93

三台民间习俗

- 人生礼俗.....赵长松 99
- 关于袍哥组织.....邓思明 111
- 三台城关七公社袍哥始末.....杨继周 杨重华 120
- 三台城址考辨.....杨宇平 123
- 补充·质疑·更正
- 裨农丝厂丝产量应矫正.....邓惠生 127

三台早期的共产党人

唐宏毅

三台早期的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

追求真理 投身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一九二〇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八月以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北京建立中国共产党小组；董必武、毛泽东、谭平山、王烬美等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山东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党小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必要条件。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各小组纷纷响应，选出十三名代表，代表五十三名党员，于七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成了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三台的先进分子

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看到中国的未来，看到中国的希望。为了寻求革命真理，立志救国救民，一些先进分子纷纷到外地求学。一九二一年秋，谭卫根（谭荣葵，三台县两河乡人）于潼属联中肄业，在校期间，他和同班好友王蕴中（王心诚、王文中、王敬贤、王进先，三台县三元乡人）从《新青年》杂志上读了许多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受到启迪，决心去北京求学，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由于王蕴中的祖父不同意，谭卫根又去王的家中，在其叔父的帮助下，说服了他的祖父，但事后又动摇了。因此，谭卫根于次年四月，与同乡好友贺诚（贺宗霖、贺润滋，建国初，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去到北京，和一九一九年考入北京师大的王棣之同处，彼此畅谈了家乡和北京的情况，心情愉快，十分激动。七月，左道之（左军、左士、左正元，后在苏联用名里必辛斯基，三台县新生乡人）亦去到北京，与谭、贺一起复习功课，积极迎考。是年秋，谭卫根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历史系，获得公费生的优厚待遇。贺诚、左道之也分别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彼此联系密切，互勉于学，奋发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积极投入工人运动。

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往北京，主任改由邓中夏担任。他住在北京中老胡同公寓，打电话到国立农专，要杨开智、乐天宇去谈学习和工作情况，告诉他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要成立，希望农专能成立一个支部。杨、乐接受任务回校后，以农专社会主义小组为基础，吸收了李启耕（荣光）、左道之、胡求仙等八名团员，成立了国立农专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农专支部），乐天宇任书记。后来，农专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改为共产主义青

年团支部（简称C·Y、农专支部）。一九二四年一月，农专共青团支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甄别，除退了一名消极分子外，其余的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因此，左道之是三台县第一个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先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党的纲领指引下，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工人罢工斗争如火如荼，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这革命激流的推动下，加之谭卫根等好友的鼓励和帮助，王蕴中毅然挣脱家庭的束缚，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偕同乡友谭益彰（谭襄诚、谭荣锦，三台县象山乡人；象山乡一九五三年划归蓬溪县）、左治生（左绍龙、左寿昌、左鸿暄、左鸿国，三台县秋林乡人）、杨蕴璞（杨征，三台县象山乡人）、蒋瑞琪和杨征辅等先后去到北京，受到谭卫根、贺诚、左道之等的热情接待和照顾。他们经过紧张地复习，于次年参加高考，王蕴中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左治生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杨征辅考入北京大学，杨蕴璞、蒋瑞琪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入学后，大家团结甚密，精神奋发，勤学不息，尤倾心国事。这时，他们就读的学校都有了党、团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不仅孜孜不倦地阅读《新青年》、《工人周刊》、《向导》、《政治生活》和《晨报》等报刊上的重要文章，而且不懈地攻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去观察国家命运，分析客观事物，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使自己在政治上日

趋成熟。根据本人申请，党组织考察，经左道之介绍，于一九二四年春吸收贺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秋，经贺诚、左道之介绍，先后吸收谭卫根、王蕴中、谭襄诚、蒋瑞琪、左治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杨蕴璞也在朝阳大学入了党。至此，三台留学北京的有八人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中，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

舍生忘死 奋不顾身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北京地委高举反帝反军阀的旗帜，集中力量发展工人运动，开始领导农民斗争，并使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正是这个时候，谭卫根、贺诚、左道之考入大学，在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更加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于是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开始，他们到长辛店举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行，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帮助完善工会组织，建立工人俱乐部，俱乐部下设纠察队、讲演团、调查团，组织十分严密。他们在与工人的共同生活中增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增强了自己的斗志。一九二二年双十节，北京党组织根据李大钊同志的指示，利用当时庆祝“国庆”的机会，组织了以反对封建军阀为主要内容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长辛店、北京机器工业研究会工人、各校学生和市民参加了这次活动。游行时，谭卫根、贺诚等积极散发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印制的《敬告国人书》和《敬告劳动者书》。两篇洋溢革命精神的文告，深刻阐述了党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主张，

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欺凌中国的种种罪行。它是讨伐中国人民两大敌人的革命檄文，致使工人罢工运动迅速发展，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长辛店工人拉开了这次罢工的序幕，接着爆发了闻名全国的开滦五矿三万多人的一大罢工，相继又有唐山和京绥路工人罢工。数万工人直接与帝国主义和军阀搏斗，坚持了二十天之久。大钊同志领导了这次罢工。为了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学生成立了“北京开滦五矿罢工经济后援会”。谭卫根不仅积极参与组织筹建工作，而且与同学们一道，日以继夜地向各方面进行募捐，并将募捐的钱物分送给罢工工人。同时后援会还向全国发布了宣言，扩大了这次罢工的社会影响。

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也开始进行斗争。北京的农民运动首先是从西郊开始的。北京农业大学校址当时在罗道庄，周围有许多村庄，如公主坟、什坊院、跑马厂、大井、小井、大瓦窑以至羊圈头等，学生一出校门就是农村。左道之人学后，在农大社会主义小组乐天宇等同志的带领下，经常深入到学校附近的村庄，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后来逐步扩大活动范围，直到西北方向的温泉、卧佛寺、西山一带地方，广泛和农民交朋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通过做农运工作，左道之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不仅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而且学会了做群众工作，提高了工作能力，因而农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就入了团。在团组织的领导下，更加尽心尽力从事农运这一工作，同时积极参加北京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之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底，为了加强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共北京地委成立了农运领导机构——北京地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开始，农

委由大钊同志直接领导，日常工作由乐天宇负责。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党组织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将留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并在山东从事农运工作的李怀才调到北京，担任农委书记，乐天宇、左道之、詹乐贫、李启耕为农委委员。在农委的领导下，京东地区的部分县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农委因势利导，依靠当地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掀起了抗捐、抗税和反对贪官污吏的怒潮，有的捣毁了税局，有的捣毁了县政府、县议会，向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黑暗统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继工农运动之后，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一九二三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彭允彝安置私党、克扣教育经费和军阀政府的压迫，愤而辞职。北大由二十人组成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主持校务。在大钊同志的领导下，迅速开展了“驱彭斗争”的学生运动。这时，谭卫根、贺诚已是学生会的领导骨干了。他们与教职员的斗争紧密配合起来，发动学生开展宣传活动，并通过各种关系争取社会的支援，扩大了这场斗争的影响。随着驱彭学生运动的发展，又增加了反帝的内容。一月十九日，由北大学生会发起，聚集各校一千多名学生向军阀的“众议院”请愿，要求收回旅大，遭到军警毒打，受伤者达三百多人。北大教职员临时委员会立即发表声明，谴责军阀政府的暴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致使这场斗争，进一步发展成为以打倒军阀，推翻军阀政府为中心内容的群众运动，迎来了革命高潮。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实行血腥屠杀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全城沸腾起来了。北京党组织迅速将各

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学生中成立了“沪案雪耻会”，工人中组织了“工人雪耻会”，之后又成立了有四百八十多个团体参加的“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并于六月三日、十日、二十五日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三台在京的十多名同学都参加了雪耻会，与同学们组成各种形式的演讲队、演说团，连日奔赴大街小巷和郊区农村，广泛深入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发动群众投入这场斗争。参加游行示威的人由五万人、二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第二次示威游行前，在天安门召开了五卅运动中第一次“北京国民大会”，会场上搭起五个讲台，同时进行演讲发言。二十万人悲愤交集，群情激昂。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援助被害者！”“救国救民坚持到底！”等口号，当场有人用血书写“誓死救国”四个大字，表示决心。最后，大会通过了《北京国民大会宣言》，充分显示了北京人民和这次大会彻底的反帝革命精神。当天中午，烈日如火，会后游行示威时，又下起大雨，水深过膝，但二十万群众仍坚持到底，冒雨游行了二十多里，而热情越来越高昂，口号声响不断，游行的声势也更加雄壮，形成了一幅火热的群众斗争的壮丽图景。随着运动的发展，北京党组织引导群众把反帝爱国运动和当时世界的反帝斗争紧密地汇合起来。六月三十日，北京学生、工人等五百多个团体于天安门举行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邀请了朝鲜、印度、土耳其等国家的代表参加。会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震动全场，与会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

除了几次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外，北京党组织还发动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抵制英货、日货的运动，打击了帝国

主义的气焰和威风。学生罢课从六月三日到九月八日，坚持了三个多月。在这期间，谭卫根等还受党组织的委托，组织北京各校的进步学生到冯玉祥部队受军训，时间达三个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学生军”。《学生军组织大纲》规定，组织学生军的目的是“讲求军事教育，以为领导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之准备！”之后，又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了“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工人中组织了“工人保卫队”，农民中组织了“农民自卫队”，准备为革命进行战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场以推翻段其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革命运动终于爆发了。这天上午，各校学生敢死队和各厂工人保卫队开始出动，很快，各种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标语贴满了北京，数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屋顶上竖起了革命红旗，迎风招展，革命气氛笼罩全城。下午两点，神武门已是人山人海，旌旗蔽空。经过同段其瑞军警搏斗，流了血，受到了锻炼的群众象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了。队伍的前边是学生敢死队和臂缠红布套的工人保卫队，显得格外威武。中间是一般群众团体和市民。最后是看护队。大家手拿木棍等武器，在神武门举行示威大会。而后，雄纠纠气昂昂地向段其瑞政府进发。大钊同志参加了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段其瑞卖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建设国民政府！”

“解散关税会议！”等口号。随即，群众队伍迅速包围了段其瑞的执政府，并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由于执政府已停止办公，大队又开往段其瑞住宅，准备举行群众公审，驱逐这个卖国贼下台。由于国民党右派告密，出卖了革命，使我们党领导的这次夺取政权的斗争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它给了反动军阀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革命群众的

力量。

经过多次革命斗争的洗礼，谭卫根、王蕴中、左治生分别担任中共北京大学、工业大学、中国大学支部的领导工作。

五卅运动以后，奉系军阀代替了原来直系军阀的位置，秉承日、英等帝国主义的旨意，屠杀工人群众，镇压革命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舰“掩护”奉军炮击大沽口，直接发难。三月十五日，日、美、英、法等八个辛丑条约参加国，向北京段其瑞政府提出所谓“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段其瑞反动政府竟然全盘接受，于是激起了北京各界群众的无比愤怒。党组织及时作了部署。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市学联等团体的二百多名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分两队去请愿，一队去执政府，一队去外交部。去执政府的七八十名代表，推举陈毅同志等三人前去交涉，其余的人列队大门等候。反动政府恼羞成怒，竟用刺刀当场刺伤多人，开始大屠杀。三月十八日，二百多个社团、十多万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参加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会场上挂起了昨天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大会向与会者报告了请愿的详细情况，大钊同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这时群众高呼：“打倒段其瑞反动政府！”“打倒帝国主义！”“誓死不屈！”等口号，与会者个个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决心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并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的决议。会后，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西牌楼，然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执政府”门前列队请愿，这时，北新桥以南，交道口以东，铁狮子胡同东西两口，“执政府”东西辕门及大门口，早已密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代表们要求会见段其瑞，突然“执政府”门

楼的窗户里响了枪声，大门口的军队立即行动，东西辕门的卫兵也同时开枪。几百平方米的空场上，刹时鲜血遍地。但大多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表现了临危不惧、凛然不屈的英雄气概！这次惨案，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二百多人。血的事实，又一次无情地揭露了反动派凶残、无耻的本性，极大地教育了人民。第二天，北京各学校停了课，许多学校为烈士举行了追悼会。三月二十三日，北京总工会、学联等团体又在北大举行了追悼大会，会场上高悬“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八个大字。会上，有的青年咬破手指，扯下衣襟，用鲜血写下自己的誓言，决心完成烈士的未尽事业。

在“三·一八”运动中，谭卫根连中枪弹，身穿四孔，流血过多，昏绝于北京协和医院。王蕴中对卫根医药，照顾备至，前后数月，爱护之周，有逾骨肉。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革命群众运动转入低潮，党组织也逼迫转入地下斗争，党员进行了疏散和转移。贺诚被党派到广州参加北伐，在总司令部野战医院服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由吴玉章介绍到武昌陆军医院当医生。左道之由中共中央送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后派驻第三国际工作。左治生先到西湖，后去日本留学。1928年，在日本由韩鲁、杨玉珊介绍加入中共党的组织，称中国海外支部。杨蕴璞入黄埔军校学习后，参加了八一建军运动和广州起义暴动。谭袁诚、蒋瑞琪、杨征辅返乡。谭卫根、王蕴中留在北大、工大支部工作。这时，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起来，加紧对革命进行疯狂迫害，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北京城里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布告。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指挥下，各种反动势力组织了所谓“国民制赤会”和

“反赤大同盟”等，猖狂地向革命进攻。严重的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了北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卫根、蕴中在党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于革命的秘密工作，发展组织，参与办《烈火》、《新生》等刊物，进行革命宣传，发展了革命力量。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四月二十八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和二十名革命者英勇就义！北京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局势十分紧迫。革命组织内外分化，军阀统治更加野蛮，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卫根和蕴中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倍努力工作，因而卫根由北大支部调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蕴中山工大支部调任北京市委交通。“八七”会议后，中央派王荷波、蔡和森到北方成立了北方局。北方局迅速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重建和恢复各地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准备趁奉系军阀和晋系军阀混战之机，举行工人武装暴动。九月，北京市委恢复，卫根任市委候补执行委员，蕴中仍任市委交通。当时，市委机关在东城羊市胡同二十号。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卫根和蕴中在距市委机关较远处租了一间房子，每日各自在工作岗位上集中精力苦干，深夜才返回租房住宿。之后，卫根由市委调北方局工作。当时北方局掩护在某京官公馆内，由蔡和森领导。和森与外面通电话，自称是某京官的“三姑少爷”，卫根等即为和森的随从。因此行踪更加秘密，很少与社会接触。

在市委的领导下，北京市总工会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西单藤牌营四号成立。总工会成立后，计划待奉系军阀败至芦沟桥时，组织工人群众拆除铁路，抢枪炮、军装、粮食，没收资本

家财产，举行武装暴动，并油印发出了紧急通知。十月十五日，南口工会组织委员路景和委托南口工人董建忠到市总工会取传单。董取到传单后，因天晚未赶上火车，欲投亲住宿，但又不知其具体地址，便在河西叫喊，以致惊动了警察，将其抓获，搜出传单，逮捕了王敬臣等数十人。由于叛徒的出卖，北京市委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波及北方局。王蕴中被捕后，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十一月十八日，北方局和北京市委王荷波、王蕴中等十八人在安定门被枪杀。建国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为十八烈士。

在党组织被破坏的严重情况下，中共北方局机关被迫迅速分散，转移住所。和森初移住某印刷厂（党组织开办的），叫卫根每日前往接头。随后印刷厂被查封，卫根便与组织失去联系。这时，北京军警侦捕卫根很急，无地寄住，便于一九二七年底到东北哈尔滨，依好友王棣之、楚图南，化名赵襄诚，在特区第二和第三中学教书。

举办“梓光” 唤起群众

一九二四年，三台先后到北京读书的有卫根、贺诚、左道之、王蕴中、左治生、谭襄诚、杨征楠、杨蕴璞、蒋瑞琪、谢藻祥、许可经、李味泊和在南京东南大学的文萍智（子慧）等十三人，先后参加了“四川革命青年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两个党的外围组织。为了传播马列主义，扩大革命影响，唤起人民群众，于一九二五年冬成立了“梓光社”，并积极筹备发行《梓光》杂志。在北京和三台热心人士的鼓励和支持下，《梓光》终于创刊了。第一期十六开本，一百余页，刊载各类论文十余篇，其中《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等文章，具

有相当的理论水平，曾获得各方面的好评。后因经费困难，压缩了篇幅，不定期出刊。每期除在北京发行外，给三台县送一百多份。“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北京党组织被破坏，党员大都暴露，无法进行活动，均纷纷离京，异地就业或转地求学，因此，梓光社这一进步组织就自然地宣告结束了。《梓光》杂志虽然时间不长，印数不多，但却在三台县里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各阶层人民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九二八年秋，谭襄诚从外地回到三台潼高中任教，在三台高中发展党团员。一九二九年二月，谭卫根又从东北回到三台高中任教，与谭襄诚介绍潼高中英语教员谌伯龙入党。谭襄诚又同侯伯英介绍城关小学教师文淑璧入党。这些同志对三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推动三台人民前仆后继地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八七年八月

资料来源：县委党史办

国民党人 徐 堪

马 宣 伟

徐堪，原名徐代堪，字可亨，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1888年12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中兴乡段家湾。祖父徐桐庭，廪生；父徐奋卿，秀才，都在家乡教书为业。徐堪自